

关于蒙古史诗的类型研究

蒙古族 仁钦道尔吉

蒙古史诗研究,现在已成为世界性学科。史诗这种最早产生于人类童年时代的文学样式,如今在许多国家和民族的民间失传,只留下一些早期记录的版本。然而,蒙古史诗却很特殊:迄今在民间仍以口头形式流传着大量的作品。我去年作了初步统计,目前在国内外已经出版和被记录但尚未出版的蒙古史诗共计约有二百八十多部。这些史诗的形式和篇幅不尽相同,其中多数是以数百行诗所组成的短篇史诗,也有一批长达数千行至上万行的中篇史诗。此外,还有长篇的组史诗(这里我们借用“组诗”这个名词,把《江格尔》等以人物为中心,并且各部在情节上又能独立的史诗叫作“组史诗”)《江格尔》和《格斯尔》。蒙文《格斯尔》的多种版本都是散文体,但有一种布里亚特的《阿拜格斯尔》是韵文体,它长达三万诗行。《江格尔》这一部长篇组史诗的全诗约有十万行,目前在我国发现了它的六十五部(或章)作品的一百多种异文,在苏联记录的有近三十部,蒙古人民共和国出版了二

十多部。

蒙古史诗不仅数量巨大、形式多样,而且内容极其丰富多采,广泛地反映了蒙古族古代社会的历史和风土人情,具有进步的思想意义和优美的艺术特色。因而,二百年以来蒙古史诗引起了各国学者的注意。搜集出版蒙古史诗已有近三百年的历史。最早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出版了著名的北京木刻版《格斯尔可汗传》。从十九世纪初(1804年)以来,开始在俄国搜集出版了《江格尔》的一些部,约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起搜集出版了其它短篇史诗。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主要是俄罗斯—苏联和德国学者从事蒙古史诗的搜集出版和研究工作,从五十年代以后,除苏联外,蒙古人民共和国学者在蒙古史诗的出版和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同时,我国及东欧、西欧学者也开始进行蒙古史诗的出版、翻译和研究工作。在蒙古史诗研究方面,苏联科学院院士鲍·符拉基米尔佐夫、斯·科津、通讯院士尼·波柏(现住美国)、芬兰学者格·拉姆斯特德、西德教授瓦·海希西、蒙古科学院院士策·达木丁苏伦、宾·仁亲、通讯院士普·霍尔劳、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院士波·帕兀哈等著名学者完成了许多重要著作。

自从六十年代以后,蒙古史诗研究发展到了新阶段,逐渐成为世界性的学科。这门学科在数量和质量方面都有较大的提高。一方面,从事这项工作的国家和学者的数量有很大的增加,他们出版了数百种论文和专著;另一方面接触到了蒙古史诗的各个方面的广泛性的问题,学者们采用各种新的研究方法,从各个不同角度,进行多层次的研究,深入细致地分析了一些复杂性的问题。随着研究这门学科的国家 and 学者数量的增加,各国学者之间建立了密切关系,他们相互合作,并为进行学术交流而制定了召开各种国际性的会议制度。例如,在1959年、1970年、1976年和1982年在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先后召开四次国

际蒙古学家大会。当然，这些会议不是专门讨论史诗问题，但在会议上宣读了不少有关史诗研究的论文。苏联学者不断地研究蒙古史诗，几十年前，日尔蒙斯基和麦列丁斯基在史诗理论研究著作中，就一直把蒙古史诗作为例子引用。苏联学者先后出版了几百种研究蒙古史诗的专著和论文，并在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首都厄利斯塔市几次召开了全苏民间文学专家和民族学家参加的大型的蒙古史诗讨论会，即于1967年举行的“纪念著名的江格尔奇鄂·利杨夫拉诞辰110周年”学术讨论会、1972年在为纪念《江格尔》学家瓦·科特维茨诞辰100周年而召开的“阿尔泰学和蒙古学问题讨论会”以及在1978年开的全苏“《江格尔》与突厥—蒙古各民族史诗创作问题”学术讨论会。近年来在苏联蒙古史诗研究，尤其是《江格尔》研究和《格斯尔》研究有很大的发展，格·米海依洛夫、斯·涅克柳多夫、鲍·李福清和阿·科契克夫等学者发表了许多著作。尤其是1984年出版的斯·涅克柳多夫的《蒙古人民的英雄史诗》一书，¹是近几十年来研究蒙古史诗方面的重要著作之一，它概括了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各国蒙古史诗及其研究成果，探讨了各地蒙古史诗的一些重大问题。

西德著名的蒙古学家、波恩大学教授瓦·海希西四十多年来不间断地进行蒙古史诗的研究，在他的领导下，波恩大学中央亚细亚语言文化研究所已成为欧美研究蒙古史诗中心。他们翻译了七十多部蒙古史诗，把这些史诗及其演唱艺人，看作世界史诗理论研究的活对象。海希西教授说：在蒙古和突厥各民族地区，英雄史诗依然存在，并且经过改变以新的形式流传至今。这样，就有可能使对所谓口头流传理论的研究不是局限在阅览室里，而是要研究活生生的对象²。在他主持下，1978—1983年波恩举行了四次国际“蒙古史诗讨论会”，参加会议的有西德、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瑞典、奥地利、日本

及苏联、蒙古人民共和国、匈牙利、东德、南斯拉夫和我国学者，在这四次会议上宣读了近八十篇论文。在瓦·海希西教授主编的《亚细亚研究》和《中央亚细亚研究》两套大型丛刊中蒙古史诗原文、译文及其研究著作占十多卷。此外，在1983年出版了海希西教授的专著《北京木刻版〈格斯尔可汗传〉的续第六章研究》³。这是近年来国外《格斯尔》研究方面的一本重要著作。

上述情况可以说明蒙古史诗研究已经成为一门国际性科学。尽管各国学者研究蒙古史诗的目的和方法有别，但在国外普遍盛行的是类型研究方法。许多外国学者把民间故事的“AT分类法”运用到蒙古史诗方面，采用这种方法来分类蒙古史诗的情节类型和母题类型，并对这些类型进行分析。人们知道，类型学属于比较文学研究范围。比较文学早已产生，它的先驱是维尔曼、安培、基内等世界主义者。但只是在十九世纪歌德和史雷格兄弟等人提出“比较文学”、“世界文学”等口号，才把这个概念明朗化了。近代出现了法国学派、美国学派和中间学派。在比较文学中“类比研究”和“影响研究”被看作是两个主要方向。西方学者正是从这两个方面来研究蒙古史诗的，当然，他们更多的是侧重于类比研究。因为，他们研究蒙古史诗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说明世界各国史诗的共同性理论问题，找出史诗体裁形成和发展的一般规律。海希西教授在他主持召开的国际第一次蒙古史诗讨论会议上说：“从研究英雄史诗体裁的产生和典型内容来看，不仅欧洲骑士时代的史诗和古代史诗得到了广泛发掘，而且也有一系列中亚突厥民族史诗业已公诸于世。然而，为数众多的蒙古英雄史诗却又当别论。特别是在西欧语言中缺乏翻译作品，因而不可能引用蒙古史诗进行史诗的一般理论研究⁴。”为了弥补这一空白，近年来西方学者翻译了七十多种蒙古史诗，并进行情节和母题类型研究。文学类型

研究需要有一定条件，法国学者马·法·基亚说应具备两个条件：固定的类型和接受这种文学类型的环境（时间和空间都明确限定的）⁵。我们知道，我国蒙古族人民、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喀尔喀人和卫拉特人以及苏联的布里亚特人和卡尔梅克人，他们的祖先曾共同居住在中央亚细亚和南西伯利亚，甚至阿尔泰语系的其他许多民族（包括突厥语族人民和通古斯语支人民）的祖先也曾经同住在这类地区。在他们之间既有历史渊源所造成的血缘关系，又有地域衔接所造成的因果关系。苏联和西方学者通过类比研究，发现了蒙古史诗和突厥史诗的各种类似现象，并接触到了蒙古、突厥史诗同通古斯——满洲叙事作品（如英雄故事）的许多重要的共同性。苏联蒙古学家斯·涅克柳多夫在《蒙古人民的史诗与民间文学的相互联系问题》⁶一文中，指出了蒙古——突厥史诗在类型学和其他方面的许多共同性，并说明了蒙古——突厥史诗与通古斯英雄故事之间的类似现象。美国学者伊尔塞·洛德—西尔托特斯在她的《蒙古和中亚突厥史诗中的几个共同点和不同点》⁷一文中，列举了它们九个方面的共同性。她认为蒙古和东突厥史诗的英雄具有超自然的力量，他们施展法术达到自己的目的。可是，中亚突厥史诗的人物没有这种超自然的力量，他们是现实生活中的人。除这种不同点外，蒙古和突厥史诗有以下共同性：

1. 中亚突厥史诗以没有儿女的老人祈求得儿女为开端，在蒙古史诗中也有个别类似现象；

2. 祈求得子女的结果，出现将得子女的予兆；

3. 对新生儿的描写也类似，如在蒙古和阿尔泰突厥史诗中新生儿有金色的胸膛和银色的臀部，他们的脐带难以切断；

4. 给新生儿起名的情况相似；

5. 英雄长大后所参加的冒险活动都一样，即战胜掠夺者和到远方去通过斗争娶美

女；

6. 选择和寻求配偶情况类似；

7. 英雄娶亲必须经住赛马、射箭和摔跤的考验；

8. 蒙古和东突厥史诗的英雄在斗争中施展法术；

9. 突厥史诗的神奇的母题正在变化着，虽然在西突厥史诗的神奇现象已消失，但在他们的民间传说中仍然存在着。

此外，还有一些外国学者把蒙古史诗、突厥史诗与希腊和印度的神话和史诗作了比较。尽管这些国家和民族人民之间没有什么血缘联系和地域衔接关系，但是文学的发展是为社会发展的过程所决定的，它在社会发展的共同阶段具有极大的相似，尤其是作为一种文学现象，作为文学作品的一种样式，它们之间必然会有某些关系，必然会有某些共同的有关产生和发展的规律。如蒙古学者沙·嘎当巴在《〈蒙古秘史〉与文学联系》⁸一文中，考证了“都蛙锁豁儿”一词。《秘史》中说：“都蛙锁豁儿的额中生了一只眼，能望见三程的地方。”作者根据这种用法认为，它是由突厥语和蒙古语两个部分组成的混合词，意思为“独目巨人”。这一形象出自民间口头文学，多半来自古希腊的波利非姆型人物。嘎当巴还提出了在《秘史》和《伊利亚特》中出现的同一类型的叙事和描写方式。美国学者尼·波柏认为蒙古史诗中敌人的灵魂变成了鹤鹑、小鹿等动物及英雄化作不同形象追踪敌人，这使人想到印度《僵尸鬼故事二十五则》⁹。嘎当巴在上述论文说，敌人化作鹿、野马、鱼，追击它们的英雄变成海青等鸟的现象，在希腊的希罗多德的著作中就有类似的母题。这种现象来源于西徐亚人。然而，这到底是受到外来的影响还是在共同的社会基础上产生的类似现象，目前尚无确凿的根据，不过，蒙古史诗与其他民族和国家的史诗之间确实具有某些共同性，所以，蒙古史诗及其演唱艺人的研

究，必然对探讨欧洲和世界各国史诗具有借鉴作用，对研究史诗体裁的发展规律具有重要的意义。如今，德国学者对蒙古史诗的重视完全可以与几十年前德国学者对斯拉夫史诗的重视程度相比。瓦·海希西教授在上述一篇论文中就明确说，对蒙古史诗的研究“对找出史诗形成的规律有一定的意义。”

外国学者比较研究蒙古史诗是以民间故事的“AT分类法”为前提的。关于这种分类法，刘魁立同志曾专门发表过一篇详细论述的文章^[10]，我就不多谈了。这种原来针对民间故事的分类法，后来被逐渐运用到神话和史诗的范围。

当然，在蒙古史诗的分类方面，不是一开始就采用这种分类法的。瓦·海希西和斯·涅克柳多夫先后介绍过各国学者对蒙古史诗结构的分类情况。据他们长久以来，人们把欧洲史诗的结构分为两大类：一、求婚史诗；二、失而复得史诗。苏联著名学者弗·日尔蒙斯基把这种分类方式运用于中亚突厥英雄史诗的分类上。

最早对蒙古史诗进行分类的是原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尼·波柏。他在1937年出版的专著《喀尔喀蒙古英雄史诗》^[11]中，在欧洲史诗结构分类法的影响下，把蒙古史诗分为单一情节的史诗和两个或多数情节的史诗两大类。他以英雄史诗《好汉雅干达尔》和《好汗扎鲁堡莫尔根》等为例，把史诗的结构分解成四个组成部分：

1. 英雄同蟒古思的斗争；
2. 英雄的婚事；
3. 在战斗中牺牲的英雄借助于某种力量获得再生；
4. 英雄携子去战胜抢走他妻子和双亲的蟒古思，解救亲人和百姓。

尼·波柏把这四个部分中的每一部分又分为A1、A2…，B1、B2…等。

在1978年，苏联学者特·博尔查诺娃在《关于蒙古一卫拉特英雄史诗的体裁特

征》^[12]一文中把著名学者弗拉基尔·普罗普在其《故事形态学》一书中所归纳的俄罗斯民间故事的形态结构分析法运用到蒙古英雄史诗上，把蒙古史诗的结构分为八个部分：开场、希望找到未婚妻、启程远征、途中经历、斗争和胜利、消除不幸和灾难、返回家乡及英雄的婚礼。苏联学者阿·科契克夫在与上文同时发表的《关于故事史诗》^[13]一文中曾把卫拉特叙事作品的结构分为十二类：

1. 年事已高而无子女的可汗和汗后（或老两口）；
2. 无子女的老两口祈求得子；
3. 神奇的怀孕及孩子的降生；
4. 给神奇降生的孩子起名；
5. 未来英雄的神奇成长及不平凡的幼年时代；
6. 为小英雄挑选坐骑；
7. 关于英雄的未婚妻的消息；
8. 小英雄启程出征；
9. 英雄为获得未婚妻而进行斗争；
10. 英雄携妻子返回家乡，归途中离奇的经历；
11. 英雄解救被敌人奴役的父母，消灭敌人；
12. 英雄的和平幸福生活及其统治。

正如瓦·海希西教授所说，上述几种划分有相当大的漏洞，因为史诗中的许多共同性的细节并未考虑在内。

在1978年于波恩举行的国际第一次蒙古史诗讨论会上，学者们宣读了研究蒙古史诗类型的一些重要文章。如尼·波柏在过去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分析蒙古史诗结构的母题类型，他在文章^[14]里列举了常见的二十一个母题，例如：

1. 让求婚者完成艰巨、危险的任务；
2. 把猜出公主的名字作为接受求婚的条件；
3. 女仆施展诡计，冒充公主嫁给英雄；
4. 小马向射死马妈妈的敌人复仇；（一种

少见的母题)

5. 无子的老两口生一子或双子;
6. 由一位老人给初生的儿子起名,等等。

尼·波柏在这里不是系统地分析蒙古史诗的全部问题,而是顺便举了一些常见的例证而已。

运用“AT分类法”最详细地分析蒙古史诗的结构母题类型的是瓦·海希西教授。他在自己主持召开的第一次蒙古史诗讨论会上,宣读了题为《关于蒙古史诗的问题结构类型的一些看法》^⑤一文。这是一篇具有代表性的著作。瓦·海希西几十年来收集各国出版的大量的蒙古史诗及其研究著作,对为数众多的蒙古史诗进行详细的分析综合,把蒙古史诗的结构类型归纳为十四个大类,并在大类下分有若干小类,小类下又分许多相似的母题。

现将海希西教授归纳的十四个大类型列举如下:

1. 时间
2. 英雄的出身
3. 英雄的家乡
4. 英雄本人(外貌、性格及财产)
5. 与主人有特殊关系的马
6. 启程远征
7. 助手及朋友
8. 受到威胁
9. 仇敌
10. 遇敌作战
11. 英雄的机智和魔力
12. 求婚
13. 婚礼
14. 返回家乡

如前所述,海希西教授把每一个大类又分若干小类和许多母题。如“英雄的出身”这个大类被分为十个小类、十四个母题和事项;“英雄”这一大类下有二十二个小类,这些小类又被分解为三十多个母题和事项;“助手和朋友”共有十个小类、三十个问题和

事项。现在,我们把第2个大类“英雄的出身”作为例证介绍如下:

2. 英雄的出身:
 2. 1: 由人世间的父母正常生育
 2. 2: 从石头里出生
 2. 3: 英雄自行造就
 2. 4: 非尘世间产生、神生
 2. 5: 双亲
 2. 5. 1: 无子、年龄
 2. 5. 2: 为获得儿子所采取的办法
 2. 5. 3: 预卜出生
 2. 5. 4: 父母返老还童
 2. 5. 5: 兄弟姐妹
 2. 6: 降生时发生的事情和降生标志
 2. 7: 英雄出生的年龄
 2. 8: 英雄年龄始终不变
 2. 9: 起名
 2. 10: 其他出生时的习俗。

因篇幅关系,海希西教授分类法就介绍到这里。在我国没有人作过蒙古史诗的母题类型分类。我在为纪念瓦尔特·海希西教授七十寿辰而作的题为《关于巴尔虎史诗和卫拉特史诗的共性与特性》^⑥的论文中,为了比较这两个地区(或两种流派)的史诗,把史诗的基本结构分为三大部分,即序诗、故事的前奏和主要故事。此外,还有一部分是不能归纳为类型的派生情节。我把序诗分为七个事项(或母题),故事的前奏分为十一个事项,主要故事分为婚姻故事和征战故事,在征战故事中还有两种类型,共计四十多个母题和母题群(部分情节)。我只是把两个地区(或两种流派)史诗结构都分成若干部分去比较的,没有打算作详细的母题分类。我写那篇文章时,因为语言障碍,没有看到瓦·海希西教授的上述论文。他的分类很细致,他分析了在我国、蒙古人民共和国和苏联搜集到的七十多部蒙古史诗,把它们分解为十四大类,三百多母题和事项。

海希西教授关于蒙古史诗结构的母题分

类,至今仍属最详细最全面的分类。可以说,是瓦·海希西教授建立了划分蒙古史诗情节、母题类型的体系。几年来西方学者大都是围绕海希西体系,对蒙古史诗进行研究的。

这种史诗类型分类,对蒙古各类史诗的比较研究提供了方便条件。在蒙古各类史诗中有大量的相似的情节类型和相同的母题。尤其是各种短篇史诗具有一定的模式,这些模式便是由一些情节类型和母题的更换所组成的。因此,把所有的英雄史诗解剖为若干情节类型和母题,并对各个母题进行分析,对探讨各种蒙古史诗内部的相互关系、相互影响以及蒙古史诗同其他民族史诗的相互联系都有一定的意义。如果对这些母题不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就很难说明蒙古史诗的产生、发展和演变问题。目前,有不少西方国家和东方国家的学者足以海希西教授的分类法为依据,对蒙古史诗的结构和母题进行研究的。自从1978年以来,先后在波恩举行的四次蒙古史诗讨论会都是围绕史诗的类型问题进行了讨论。迄今为止,各国学者比较详细地分析了蒙古史诗的几十种母题。如海希西写了《关于蒙古史诗的母题结构类型的一些看法》、《从岩石里诞生和对山的崇拜》、《阿尔泰史诗母题的分类研究》、《黄金史中的史诗母题》、《叙事模式的内部逻辑和历史事实》、《论〈格斯尔〉史诗的一致性》和《蒙古史诗中的起死回生母题》等论文和北京木刻版《格斯尔可汗传》续第六章研究专著,他探讨了一系列重要问题,深入解释了蒙古史诗的结构和母题。尼·波柏和他的助手突厥学家伊尔塞·洛德—西尔托特斯完成了《对蒙古史诗母题的研究》、《蒙古史诗中的天鹅姑娘》、《蒙古史诗中的叛变和谋杀母题》、《以贫苦小伙子形象出现的英雄》、《蒙古和中亚突厥史诗中的几个共同点和不同点》等论文,他们对蒙古史诗的母题、蒙古史诗和突厥史诗的一些共同性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如前所述,苏联学者在研究蒙古史诗方面,尤其是在研究《江格尔》和《格斯尔》(布里亚特版本)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例如阿·科契克夫用俄文和卡尔梅克文发表了《江格尔》研究专著^①。如前所述,斯·涅克柳多夫的《蒙古人民的英雄史诗》一书,于1984年在莫斯科出版。苏联学者在1978年召开的“《江格尔》与突厥—蒙古各民族史诗创作问题”讨论会上宣读的论文和会前会后发表的不少文章中接触到了《江格尔》和其他史诗的类型学问题。如在这次会议论文中有十三篇专门谈了类型问题。苏联学者分析的类型问题有:《江格尔》的情节结构,《江格尔》中所反映的卡尔梅克人的物质文化(如食物和住宅)、家庭—婚姻关系、“英雄的助手”母题、关于英雄出身的古老母题、英雄神奇诞生的母题,神箭手的母题、神话色彩的形象和情节以及《江格尔》与各种史诗关系等问题。此外,有的学者研究了蒙古说书和东蒙古史诗的妇女形象、蒙古史诗中的生命树(或智慧树)母题、灵魂崇拜母题,等等。

为了更好地说明母题研究情况,我们简单地列举几个实例。如海希西教授在一篇文章中专门探讨蒙古史诗的英雄诞生于石头的母题,他不仅对各类史诗中的这种母题进行分析,而且把这种母题与萨满诗歌作比较,说明这种观念可能来源于萨满教的山神崇拜,它产生于石器时代。又如尼·波柏研究蒙古史诗中的天鹅姑娘母题,说难以考证这种母题的起源。它可能与敦煌发现的八世纪的所谓昆仑版本有关。另一方面,“它也可能属于欧亚大陆古老文化的共同财富”。他说,有的学者认为,天鹅姑娘最早起源于图腾崇拜,确实布里亚特人认为他们是天鹅的后裔。蒙古史诗的天鹅姑娘母题“同中亚和东西伯利亚突厥史诗和神话中的天鹅姑娘十分相似。”所以,如果深入研究蒙古史诗,必须重视突厥民间文学材料。由此可

知,母题类型研究对确定史诗情节组成的各个部分的来源和产生时代具有重要的意义。

海希西教授分析的主要是较短的蒙古史诗的结构和母题。至于长篇英雄史诗《江格尔》和《格斯尔》的完整的结构类型,问题还没有人作过系统的分析。如前所述,各国学者虽然对蒙古史诗的一些母题进行了一定的探讨,但还存在的问题仍然不少。一方面,大量的母题没有人接触过;另一方面,某些学者已经接触到的一些母题,也还分析不够深刻,没有全完搞清楚它们的来源和发展变化。

在我国,史诗类型研究尚未充分展开。我们现在还停留在对史诗的综合性研究阶段。诚然,这种研究阶段是不可缺少的,因为,直到本世纪五十年代,尤其是近年来,我国蒙古史诗才有大量的发掘和出版。许多工作需要从头做起,我们应该系统地了解我国史诗的总的面貌,对这些史诗作综合性的评价。然而,在各种流派、各种理论更迭频繁,信息交流日益发达的今天,为了使包括蒙古史诗在内的我国各民族民间文学的研究有新的突破,我们必须很好地借鉴国外学者近年来的各种研究方法——其中包括类型研究的方法。尽管它已不属最新方法,但它毕竟是一种有利于揭示史诗内在特点的有效方法,能够为我们提供新的角度和层次,展现新的广度和深度,因此,我将它介绍给我国的史诗研究界,愿我们的研究工作能够尽早跨入世界史诗的研究先进行列。

- ① C.斯.涅克柳多夫《蒙古人民的英雄史诗》(俄文)。《科学》出版社、莫斯科、1984年。
- ② 瓦.海希西《关于蒙古史诗的母题结构类型的一些看法》一文,见西德《亚细亚研

究》丛刊第68卷,瓦.海希西主编、奥托哈拉索维茨、威斯巴登、1979年、第9—27页。

- ③ 瓦.海希西《〈北京木刻版格斯尔可汗传〉续第六章研究》(德文)、出版社同注②、1983年。
- ④ 同注②
- ⑤ 《比较文学》、〔法〕马.法.基亚著、颜保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10页。
- ⑥ 见《蒙古文学关系史》一书(俄文)《科学》出版社、莫斯科、1981年、第84—100页。
- ⑦ 见西德《亚细亚研究》、第68卷、瓦.海希西主编、奥托、哈拉索维茨、威斯巴登、1979年、第113—126页。
- ⑧ 见《蒙古文学关系史》,同注⑥、第76—83页。
- ⑨ 见西德《亚细亚研究》、第68卷、同注⑦、科28—36页。
- ⑩ 见《民间文学论坛》、创刊号、1981年、第56—69页。
- ⑪ 尼.波柏《喀尔喀蒙古英雄史诗》(俄文)、莫斯科—列宁格勒出版、1937年
- ⑫ 见《〈江格尔〉的类型学和艺术特点》一书,卡尔梅克书籍出版社、厄利斯塔、1978、年第15—24页。
- ⑬ 同注⑫、第3—6页。
- ⑭ 同注⑨
- ⑮ 同注②
- ⑯ 《瓦尔特.海希西七十寿辰纪念论文集》,威斯巴登、1983;《内蒙古民族师院学报》、1983年第二期。
- ⑰ 科契克.图勒《英雄史诗江格尔》(卡尔梅克文)、卡尔梅克书籍出版社、1974年厄利斯塔;2阿.科契克夫《英雄史诗江格尔研究》(俄文)、卡尔梅克书籍出版社、1976年、厄利斯塔。